

旧朝崩塌与新制难产的双重悲歌：唐德刚以一支史笔剖开「袁氏当国」的荒诞与沉重

JokingKong · 2026-07-21 21:20

如果我们把历史看作是一条河，大多数人关心的只是水面上的波光粼粼，或是偶尔跃出水面的大鱼。但凡是真正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，总会不自觉地盯着那些看不见的礁石和激流。有时候，我们站在河岸上，觉得对岸近在咫尺，只要纵身一跃就能抵达彼岸，过上想象中那种名为“进步”的生活。可实际上，这条河比我们预想的要宽得多，也浑浊得多，不仅水流湍急，甚至还藏着吞噬一切的漩涡。这就像一个人步入中年，原以为只要按部就班就能获得体面，结果发现生活是一场接一场的意外，每一个自以为是的抉择，其实都是在深不可测的命运暗流里勉力维持平衡。这种关于转型的痛感和无奈，在读到2026年理想国牵头再版的插图版《袁氏当国》时，变得尤为真切。这本书在绝版多年后重现人间，带着大批鲜活的历史照片，像是从旧时光里打捞出来的一场迷雾。唐德刚先生在这本书里，并没有打算做一个正襟危坐、满口术语的刻板教授。他更像是一个住在弄堂深处、见惯了兴衰荣辱的史学老爷爷，在某个茶余饭后的午后，搬出一把摇椅，对着一帮充满好奇却又懵懂的后辈，慢条斯理地讲起那段距离我们百余年、却依然能感觉到余温的往事。

唐老爷子有个著名的“历史三峡”理论，这是他治史的底色。他在书里感慨道：

「在此之前的社会政治制度，原都是整个民族在数千年中，从生活实践中慢慢发展出来的文化整体。在这个整体的结构之内，帝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……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，或帝国制度，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，这种制度转型，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。事实上，东西方历史都告诉我们，这项转型运动需时数百年，始能竟其全功。」

这段话写得老辣、清醒、沉重，也极具质感。他让我们明白，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，那一刻虽然是五千年政治史的分水岭，但推倒一座破旧的木屋只需要一个下午，而要在一片废墟上建起一座抗震的摩天大楼，却需要几代人的骨血。

当时的中国，刚刚脱下长袍马褂，还没学会怎么穿西装，就急不可耐地想去参加民主派对。那种笨拙和错位，在唐德刚的笔下显得既滑稽又悲凉。孙中山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餐馆里当打工生时，突然收到武昌起义的电报，那种场景简直像是一出充满戏剧性的荒诞剧。他兼程回国，带回来的不是金钱或军队，而是一套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无法着陆的理想。唐先生调侃道，辛亥年间的黄兴其实是个有将无兵的光杆司令，国库穷得只剩下10枚银元。这种财政的彻底崩溃，注定了南京临时政府的短命，也注定了权力必然会流向那个手里有兵、心里有数的老官僚——袁世凯。

唐老爷子对袁世凯的刻画非常有意思，他并不满足于把袁世凯塑造成一个脸谱化的窃国大盗。在他看来，袁世凯不仅是一个成熟的政客，更是一个拥有第一流行政管理才干的能臣。他事必躬亲，不治私产，知人善任，若是在太平盛世，他或许能做一个名垂青史的贤相。但历史的恶意就在

于，它把一个满脑袋传统权术精髓、毫无现代民主认知的老官僚，抛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浪尖上。

书里提到了一个细节：孙中山曾与袁世凯有过一段短暂的“蜜月期”。孙公留京月余，与袁晤面13次，诚心诚意地劝袁练兵百万，自己则要去修20万里的铁路。在务实得近乎冷酷的袁世凯听来，这简直是痴人说梦。于是，“孙大炮”的外号就这么从袁世凯的嘴里流传了出来。这种细节里的“人味”，让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年表，而是两个性格迥异的男人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。

袁世凯的当国，其实是一场在法治荒野上的盲目突围。唐德刚叹息：

「要有深厚的法治基础，法律才会有效。在一个毫无法治基础的社会里，独裁者必然会无法无天。西谚“绝对的权力，绝对的腐化”，此之谓也。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，在中国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，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凯时代，哪会有影子呢？」

这是一种通透的悲观。当时的政治生态，信奉的是“养敌自重”，信奉的是“武力至上”。袁世凯通过耗尽清廷内帑、借刺客之手瓦解宗社党、授意将领逼宫这三步棋，谈笑间就完成了政变。这种效率惊人的夺权，本质上依然是传统权术的巅峰之作，而非现代政治的胜利。

宋教仁的死，是民初宪政实验最惨烈的一次夭折。唐德刚花了数十年时间探索这个案子，查阅了数十万字的档案，访问了无数遗老，最后只写下了“半张纸”的结论。他认为袁党确实是主谋，但并没有死磕袁世凯是否直接下了杀令。这种处理方式还是公允的，他想告诉读者的是，宋教仁的死，不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陨落，更是一个制度性灾难的开始。

宋教仁临死前还在给袁世凯写“遗折”，恳请他保障民权、确立宪法。这种忠君式的宪政理想，在那个暴力丛生的年代显得如此哀婉。唐德刚认为，袁党杀宋是一错，国民党兴兵讨袁是再错。这两个错误加在一起，开启了“武力至上”的恶例，直接导致了后来几十年的军阀混战。这种“各打五十大板”的做法，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圆滑，而是看穿了权力的无序扩张对古老文明的深刻伤害。

唐老爷子认为，宋教仁生前确实锋芒毕露，在讲演中直言不讳地批评袁政府“自掘坟墓”。这种纯粹政党内阁的主张，在袁世凯看来无疑是要夺他的命。当权力不再通过选票而是通过子弹来分配时，民主就成了一个被随意玩弄的玩偶。二次革命的迅速溃败，标志着美式共和试验在中国彻底流产。

而关于袁世凯称帝，传统的叙事总觉得他是个急不可耐的野心家。但唐德刚通过研究起居注发现，袁世凯竟然“刹车”了十余次。他既想着做皇帝的诱惑，又怕自己的北洋兄弟不靠谱，更怕虎视眈眈的日本。

这时候，他身边那些人开始发挥了极具讽刺意味的作用。大儿子袁克定为了圆自己的“太子梦”，伪造了一份《顺天时报》，天天给他爹看“全国拥护帝制”的假新闻。这种“信息茧房”的制造手段，即便放在今天看也让人不寒而栗。而那位美国顾问古德诺，则是另一种悲剧。这位书呆子式的学者，从纯学理的角度认为君主立宪比共和更适合中国，却没想到他的密件被杨度等人曲解成了“帝制胜过共和”的圣经。唐德刚对古德诺的评价非常刻薄但也非常深刻：

「古氏之缺点是他以一个单纯的西方政治学者，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东方政治制度大胆发言，而他

对中国近代政治史却毫无所窥……此时要舍“辛亥”，而返“戊”，岂非庸人自扰？」

1915年8月，那些乞丐请愿团、妓女请愿团纷纷上场，活脱脱演了一出人间闹剧。袁世凯最终在这一片虚假繁荣中昏了头。但正如书里所写，他要是对民国没有二心，他的统治或许还能稳如泰山；一旦他背叛民国去搞帝制，他的洪宪王朝就成了一个泡沫，一戳即破。

最凄凉的细节莫过于，那两套价值数十万的龙袍还没试穿，那九龙戏珠的宝座还没试坐，大太子还在幻想着搞“玄武门之变”杀掉皇弟，后宫里的妃子们还在为封号争吵，袁皇帝就这么病倒了，临死前只叹了句“他害了我”。这种极具画面感的叙述，把皇权的虚妄写到了极致。

关于“二十一条”，唐德刚给出了一个非常客观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为袁世凯及其团队“正名”的视角。他没有简单地扣上一顶“卖国贼”的帽子，而是详细拆解了那长达四个月的艰苦谈判。

「袁氏这时所遭遇的困境，也正是20年后蒋氏所遭遇的困境：强寇入侵，既不能战，又不能不战。唯一的办法，则是既不战，也不降，来他个无限期的拖延，也就是胡适所说的苦撑待变吧……

“二十一条要求”交涉，就这样一拖拖了四个月，日本人无可奈何，只好自动把条件减少，以免夜长梦多，引起英、美的阻扰，但是中方还在继续请坐、喝茶、研究、还价。弄得日本人实在忍不住了，至5月7日下午3时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乃亲访多礼的陆外长，向陆亲自交上一份最后通牒，同时说明日本驻华陆海军已勒缰以待，箭在弦上，势在必发。中国政府无法再拖了，终于回文“即行应诺”，便于1915年5月25日，在北京签订了城下之盟的《中日新约》九条，换文十一件；另签有关解决山东问题的条约一件，换文两件。」

唐德刚坦言，虽然最后签下的条约依然是丧权辱国，但袁世凯拒绝了致命的“第五号”，中国最终没有变成日本的印度。那种在强权面前低头、在屈辱中尽量保住一点本钱的无奈，被他写得入木三分。他对曹汝霖、陆宗輿这些人的评价也显示出史家的阔大胸襟：是者是之，非者非之，不以成见虚构。这种态度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下，显得尤为珍贵和高级。

在分析帝制覆灭的内因时，唐德刚把目光投向了北洋体系。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集团，更是一种生存模式。

「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期中，国家制度无定型、政府运作无法制的情况之下，一切靠的是人、系，或称党、称派、称团……换言之，在近代转型时期的中国，个人单干，几乎是行不通的。不论为善或作恶，你都得上有个帮。没有帮，就没有你……这本是我民族搞中庸政治的特性，也是我们的劣根性吧！」

这种分析犀利、精准、透彻，剥开了民初政治的底色。段祺瑞、冯国璋这些人的倒戈，并非因为他们突然觉悟到了共和的优越性，而是因为袁世凯的帝制威胁到了他们的接班利益，损害了“帮”的规矩。当家天下的欲望触碰到了帮派利益的底线，袁世凯就只能成为孤家寡人。

读整本《袁氏当国》，最强烈的感受是唐德刚本人的“个性”。他似乎并不在意那种严谨的社科化论文格式，他更在乎的是“现场感”。他采访过无数当事人，这让他笔下的历史有着一一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。他会把汪精卫评价为标准的诗人文人，感慨他前九次犯错都被原谅，第十次投敌才遗臭万年；他会把护国战争描写成一场双方私通款曲的“泡沫战争”。

他有时候会像个孩子一样鲜明地站队，对着那些他看不惯的小人行径破口大骂；有时候又会像个

老道人一样，客观地各打五十大板。他经常旁征博引，用中外古今的烂事儿来对比民初的这些破事儿，那种对比中的幽默诙谐，让枯燥的历史充满了荒诞的趣味。

他在书末总结袁世凯时，有一段文字充满了宿命感：

「自民国有史以来，吾尚未见一本、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。有之，或自不才始也……袁世凯，我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期中，不幸的当国者之一也。我国近代从极高度甚或是已入化境的帝国制度，要转入一个超英越美的国家、社会两得其平的后西方民主制度。袁世凯之当国正值我国近代社会、政治转型的开辟时期，而他又天生是个“治世能臣，乱世奸雄”的曹操型的人物，主观的个性和客观历史发展的轨迹，两者凿枘不投，怎能不粉身碎骨呢？」

这段评价写得苍凉、深邃、公允、悲悯。这种“凿枘不投”的尴尬，其实贯穿了整个近代史。

读此书时要注意，《袁氏当国》并不是一本完美的学术著作，它没有繁琐的注释，引文出处也往往含混不清。如果你是抱着查证每一个史料来源的目的去读，或许会失望。但如果你是想去感受那个时代的呼吸，去理解那些大人物在历史漩涡里的挣扎、自私与无奈，那这本书绝对是第一流的读物。

唐老爷子让我们看到，任何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的建立，都不是靠几次演讲、几场暗杀或几次起义就能搞定的。那是需要在一个漫长的“历史三峡”里，不断碰撞、不断试错、甚至不断倒退，最后才可能慢慢磨合出的一个模式。

他在书里深情地写道：

「我们中国，不论怎样，总是个有着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大国，更是东方文明的主流……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，不可能一无是处……不幸的是，我们老一代的探索者多是一次革命论者，一旦把这些断壁颓垣摧毁之后，都信心十足，甚至骄横万状……结果往往适得其反，新居未建，而故居已拆，群众露宿街头，饿殍载道，疠疫横行……」

这是一种极具警示意义的反思。他提醒我们，在摧毁旧世界的时候，不要忘了给普通民众留片瓦遮头。历史的宏大叙事往往掩盖了人性的琐碎与温情，而唐德刚用他那充满“代入感”的笔触，把那些被掩盖的琐碎，一点点抠了出来。

看罢，你会发现历史其实没什么新鲜事。人性里的那点贪婪、虚荣、理想与软弱，在一百年前和一百年后，其实并无二致。我们依旧在我们的“三峡”里航行，偶尔看到那个叫袁世凯的影子在岸边闪过，我们会忍不住想，如果当年他没转那个弯，我们会是在哪里？

但历史没有如果。历史只有像唐德刚这样的老爷爷，坐在摇椅上，拍着你的肩膀说：“孩子，别急，转弯的时候慢着点，这峡谷深着呢。”



扫码进原文:

<https://ximutan.com/forum/post/17>

以书会友，谈论天下

© 西木读书论坛